

Danke Li,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x+215pp.

連玲玲*

八年抗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分水嶺，一方面它標誌著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潮，另一方面，它也埋下日後國共內戰的種子。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更是塑造一整代中國人價值觀的關鍵。不過關於抗日戰爭對中國的影響，長期以來，學界一直把焦點放在政治、軍事、外交等宏觀層面。美國 Fairfield University 的李丹柯(Danke Li)教授，在這本新書《重慶回聲：戰時的中國婦女》中，試圖從個人生命經驗的微觀角度，重新書寫抗戰，總共記錄了 20 位重慶婦女的戰爭經驗，包括逃難、飢餓、生產、死亡等。對這些婦女而言，八年抗戰不僅是國家民族的保衛戰，更是個人與家庭的生存戰。因此可以說，本書乃從個人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定義抗戰，從而思索抗戰勝利對一般人（特別是婦女）的意義。

作者在前言即昭示本書的三大目的：第一是以口述史及個人記憶的方式研究婦女史及抗日戰爭史。本書的主要內容是作者於 1999-2007 年間在重慶採訪 20 位婦女的訪問紀錄，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階級、縣市，有學生、女工、老師、家庭主婦，有四川本地人，也有到重慶落腳的「下江人」。受訪者在抗戰期間都是十幾歲的女孩，本書即以她們的戰爭故事為焦點，探討抗日戰爭在婦女生活史的角色，並如何塑造個人的記憶。本書的第二個目的是突顯抗日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爭史乃性別化的論述(gendered discourse)。由於抗戰史的研究成果多忽略婦女經驗與婦女觀點，因此本書不僅是讓女性發聲，更想挑戰以男性為主的「戰爭知識建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bout the war)。第三是讓抗戰史超越國共兩黨對立的框架，給予重慶百姓在戰爭中的表現應有的認可。從上述三大目的可以看出，作者的野心是開創歷史研究的新格局，從個人經驗入手，並且賦予一般老百姓（特別是婦女）敘述、詮釋歷史的權力。

全書分為四部份，前三部份將 20 篇口述紀錄，根據「社會角色」、「經濟影響」、「政治影響」三項主題，進行分類，每部份的口述紀錄之前，有一篇五至七頁的序文。第四部份作者討論婦女與抗日戰爭的記憶。作者主要透過她的母親及妹妹聯繫上這些受訪者：作者的母親在戰時是積極參與抗戰的中學生，她的朋友、同事和她自己自然都成了本書的主角之一。作者的妹妹是中學老師，透過她的學生家庭關係，也聯絡到一些受訪者。作者共訪問了 50 多名重慶婦女，但本書只收錄了 20 人的故事，一方面可能是出版社的篇幅限制，不過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口述紀錄較短，或與其他人的故事重複。在後記中，作者製表列出 20 位受訪者在戰時的職業，其中以學生居多，共 8 位，其次是家庭主婦，共 5 位，工人則有 3 位（頁 182）。從受訪者的來源及戰時職業分布可以看出，女學生的故事比較容易被保留下來，可能與她們受過教育、能侃侃而談有關。智識階級之外的聲音則相對微弱，儘管作者已經努力保留工人的故事，但大批的農婦、小販、女傭等仍是沉默的一群。

究竟什麼因素造成人們對戰爭有不同的經歷與感受？作者認為，階級是關鍵。對於富有家庭的婦女而言，抗日戰爭所帶來的是生活的不方便；重慶第五區區長的女兒對於戰爭的主要記憶竟是「參加聚會和打麻將」！抗戰期間，她和一些有錢有勢的太太們，週一到週五都有麻將聚會，週六晚上則舉行舞會。躲警報時，還把麻將桌搬到私人防空洞裡，繼續方城之戰（頁 82-83）。然而對大多數貧無立錐之地的婦女而言，戰爭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搏鬥：由於戰爭引發的物資短缺，使生活更加艱難，連吃碗白飯都成了奢侈的享受。因此，儘管

這是一場「全面戰爭」(total war)，不同的家庭出身仍然帶來不同的戰爭經驗。

另一個決定戰爭經驗的因素是性別。作者認為，儘管全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都飽受磨難，但這種磨難帶有性別差異；婦女在性方面所受的傷害特別嚴重，這不只發生在大家所熟知的「慰安婦」或參戰士兵對平民婦女的性暴力上，也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男性對女性的性侵略上。作者舉的例子是一名從武漢逃難到重慶的年輕女子，在路上遇到兩兄弟向她伸出援手；爲了這些協助，女子必須容忍陌生男子對她的性要求。婦女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有時的確「不得不作出最壞的選擇」，不過「身體成爲全家賴以生存的機器」，是不是戰爭時期女性特有的遭遇？答案可不是那麼清楚了。Matthew Sommer 的研究指出，清代農民因貧病交加、無力耕作養家，「雇用」年輕力壯的貧窮男性爲之工作，以出讓妻子爲代價，時人稱之爲「招夫養夫」。通常被雇的男性，都是外來移民，沒有田產也無力成家，不得已只能以勞力換取部份的婚姻權利。直到抗戰時期，這種「一妻多夫」的變異家庭仍存在於中國農村，丈夫和妻子同樣都因著貧窮必須對正常的性關係作出妥協，很難說是婦女在戰爭時期才有的遭遇。

關於戰時婦女所扮演的經濟角色，作者認為，要衡量婦女對抗日戰爭的經濟貢獻時，必須著眼於她們所參與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如在前庭後院裡種菜、從田地及垃圾堆裡搜尋食物、兜售家庭手工製品及熟食等——學界估算戰時國家經濟表現時，這些活動完全被忽略不計，但它們卻是許多重慶家庭的生存之道。當然，婦女也參與像紡織廠等正式經濟活動——作者認爲這是「抗戰爲年輕女性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這個論點主要借用歐美在兩次大戰的經驗而來：由於國家徵召男性上戰場，女性開始進入各行各業填補男性所遺留的職業空缺，大大提高女性勞動力的比重。不過根據侯坤宏的研究，八年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共徵募一千四百多萬的士兵，士兵主要來自農村，罕見工廠勞工。再則，作者援引紡織廠事例，可是根據 Emily Honig 的研究，上海紡織業戰前已大量雇用女工，1929 年女工比例已高達 76%；上海紡織廠內遷，招聘當地女工，應該是戰前生產模式的延續，而非因戰爭所出現的「性別替代」。

在戰時婦女經濟參與的故事中，最有趣、卻甚少爲人所知的是松暨實驗區，這是 1938 年婦女新生活運動指導委員會爲動員婦女參加戰時生產，在重慶附近的永川縣松暨鎮所建立的紡織實驗區，除了紡織廠外，區內另設有農場、醫療診所、圖書館、消費合作社、難童學校、女工學校，及爲當地居民服務的普通中小學校。作者認爲，設置紡織實驗區，不但改變松暨鎮的經濟結構，也令國民政府認識到農村經濟是重要組成部份，在四川的農村與城市間發展出「重要的新型互依共生的城鄉統籌關係」，並使四川的農村工業「得到極大的發展」（頁 98）。然而在多大的程度上，松暨的例子可以推向大後方廣袤的農村？目前關於抗戰時期農村經濟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利用美援所建立的松暨實驗區，可以說是國民政府的「面子工程」，充其量只能視爲農村建設的藍圖；即便松暨居民的確享受到實驗區所帶來的利益，但若以松暨來推論四川、甚至重慶附近農村工業的發展狀況，則與現實相差甚鉅。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希望透過本書超越國共兩黨鬥爭的抗戰主流論述，因此特別把戰爭對婦女的政治影響提上議程。不過限於受訪樣本的數目，作者很難達成設想的目標。首先，書中討論這一個議題時，受訪者清一色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或至少同情中共的政治立場，這使得本書描述戰時婦女的政治活動及貢獻時，已有所偏頗。重慶是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宋美齡所負責的新生活運動指導委員會，甚至能夠經營兒童保育院及紡織實驗區，深入影響人們的社會及經濟生活，很難想像它會對動員婦女參與政治毫無作爲。當然，此一偏頗與作者只集中在重慶採訪有關。即便在政治氛圍相對寬鬆的今天，要在中國大陸找到願意承認自己曾經積極參與國民黨政治活動的受訪者，恐怕仍然不太容易；這從「資產階級」受訪者一再強調自己幫助中共地下黨員的事例可以看出。1950 年代以來政治鬥爭對人們的影響並未完全消退，甚至已經重塑人們對戰爭的記憶，因此，要想再現重慶婦女的政治活動，可能必須加入其他地區受訪者的故事。事實上，在作者展開戰時重慶婦女口述訪問計畫的同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劃並出版了《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2004)，共採訪 10

位走過戰爭的婦女，雖然她們各有不同的落腳處，但她們和《重慶回聲》的受訪者一樣，也曾經歷顛沛流離、悲歡離合的日子。這些來自台灣的聲音，應該能補充《重慶回聲》中的政治故事。

此外，作者將「婦女的政治參與」侷限於政黨的抗日動員，這使得「政治」成為教育菁英及經濟菁英的特權。受訪者中除了中共地下黨員外，大概只有女學生及有錢太太才有閒暇和餘錢參與抗日；工人則表示，「我們被關在工廠裡，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加上我們工作的時間又長，每天下班以後，根本沒有任何精力再做其他事情了。我也不記得在我們廠裡有過任何抗戰宣傳活動。」（頁 123）然而如果把「政治」的意義擴大為任何關於取得及運作權力地位的行為，則工人並非完全自外於政治——勞工運動即是典型的例子。即便在強調「全民團結」的抗戰時期，勞資糾紛及工潮依然層出不窮。根據劉明憲的統計，1942 到 1945 年間，重慶共出現 10 次紡織廠罷工事件，本書受訪者所工作的裕華紗廠，在 1942 年 4 月及 1945 年 1 月都曾發生罷工。比較起來，工人對日常政治(daily politics)的關注與參與，遠高於國家政治。日常政治與國家政治間的張力，其實應該可以讓作者進一步追問一個抗戰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抗戰、民族主義的意義究竟為何？特別在生活遭受巨大變動、甚至創傷時，人們如何看待或調和不同的身分認同（國家、政治、地域、性別）？國家政治動員與日常生活的界線在哪裡？

整體而言，本書為我們開啓抗戰史研究的新視角，即從婦女、從底層、從日常生活的面向重新檢視這場影響甚鉅的抗日戰爭；以此為基礎，應該可以開展出更多的關於抗戰社會史及重慶城市史研究的可能性。